

東德監聽風暴—秘密間諜史塔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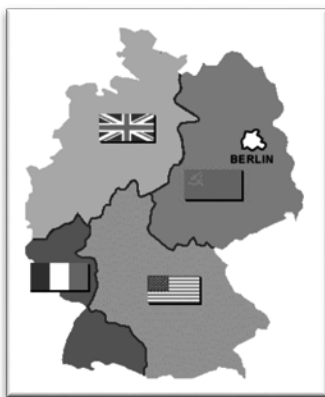
陳玥融

「我們檔案局的責任不是為受害者尋仇，也不是清算加害者，而是在真相和責任釐清後，開啟對話與和解的可能。」
—史塔西檔案局局長 Roland Jahn

無所不在的史塔西

史塔西 (Stasi) 是德語「國家安全」(Staatssicherheit) 的縮寫，但對東德人而言，這卻是個讓人聞風喪膽、不寒而慄的詞彙。

二戰過後，德國被蘇、英、美、法瓜分佔領，而隨著情勢演變，原本的四區最終變為兩區，分別是英、美、法佔領區合併而成的西德(聯邦德國)及位於蘇聯佔領區的東德(民主德國，DDR)，地理分布圖見圖一。東、西德最大的差異，便是其政治體制的不同。西德是個由西方國家共同領導的資本主義社會，而東德因為被視為蘇聯的衛星國，所以是遵從列寧思想的共產主義。



圖一：蘇、美、英、法佔領區域圖。

就如同其他共產國家一樣，東德不實行權力分立制度，而他們的最高國家機構底下又有一系列的組織，比如德國民主婦女聯盟、工會、自由德國青年等等，其中，國家安全局 (Stasi，其代表性徽章見圖二) 便是其附屬機構之一。在當時，Stasi 是一個相當有權力的組織，其工作內容包含鎮壓異己、蒐集軍事情報、逮捕犯人、監視監聽等等，是個帶有秘密警察意味的情報機關。而 Stasi 能在東西德境內建立緊密的情報網，靠的便是散布各地的情報員。根據歷史資料，至少有 60 萬人曾為 Stasi 服務(包含正式聘員與非正式的情報提供者)，在當時甚至有專門的間諜學校(史塔西學院)來培育專業間諜。而除了這些專職特工、



圖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家安全部(Stasi)徽章。

軍官及黨內部員以外，Stasi 的情報來源也有部分來自民間，使得當時的東德社會出現了人人監督彼此的奇特現象。這其中包含你身邊的同事、朋友、老師、同學，甚至連你的親人都有可能會被迫出賣你的消息，而且在你被告發之後，還會逼迫你也加入間諜的行列為 Stasi 服務。而就是因為 Stasi 手中握有如此緊密的情報網，因此「我們無處不在(Wir sind überall)」，便成為了史塔西的標語之一。

深入敵軍的情報員—Günter Guillaume

Stasi 的對外情報局在局長馬庫斯·沃爾夫(Markus Johannes)的長期主政下成績斐然，也曾被譽為是冷戰時期效率最高的情報機構。其對外間諜網路甚至深入西德的政府高層、政治界與商界，成功為東德政府獲得許多第一線的敵軍內部消息。

而在歷代所有的情報員之中，最為人所知的便是君特·紀堯姆(Günter Guillaume)。君特·紀堯姆是潛伏在西德政府中層級最高的東德間諜，在 1972 年至 1974 年曾任「華沙之跪」主角-總理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的私人

政治助理。而當他的間諜身分在 1974 年被揭穿，同時也宣告了總理的引咎辭職。

Günter Guillaume 被派入西德後，自 1957 年便開始加入德國社會民主黨(簡稱社民黨，SPD)服務，並展現了極佳的組織才能，因此不久就被推薦成為新任社民黨總理 Willy Brandt 的私人政治助理，進而踏入西德政權的核心。而 Willy Brandt 也十分信任 Günter Guillaume，因此他不僅能為總理安排行程，甚至連總理的公事包都能保管，由此可之為何他能多次獲得藏在總理身邊各處的機密情報並傳回祖國。

Günter Guillaume 被西德警方逮捕後，終於在 1981 年因為一次間諜交換機會被順利釋放回東德。

對東德來說，他是立了大功的功臣，因此他不僅被提升為國家安全部的上校，甚至被稱作「和平間諜」，並於 1985 年以「對於民主德國的和平安全與強盛做出的特殊貢獻」為由，被國家安全部大學(Hochschule des Ministeriums für Staatssicherheit)授予名譽法學博士學位。



圖三：史塔西檔案局內部成堆的碎紙袋。



圖四：史塔西博物館外觀。

史塔西檔案局

Stasi 在獲得線民的回報之後，會將每個人的資料建檔存放，其資料形式包含紙類文件、影音資料及索引卡片等等。原本這些資料應隨著東德瓦解而銷毀，但礙於其資料量過度龐大，因此在政府來不及完成銷毀工作時就被東德人民給攔了下來。

Stasi 成立 40 年來所持有的監聽資料其數量及規模十分驚人，據傳在 1989 年闖入柏林史塔西總部大樓的民眾看到的景象包含成堆已被銷毀的資料山，以及尚未被銷毀的 3900 萬張索引卡跟圖文資料百萬份，甚至大樓內所有的碎紙機都因為超負荷的工作而全部陷入故障。這些當年被市民接收下來的私密資料，如今都還被完整保存於史塔西檔案局中。

史塔西檔案局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保護並管理 Stasi 所留下的資料，而民眾可以依據「史塔西檔案法」的規定調閱自己的案底。據資料統計已有超過 600 萬次的申請，包含個人申請、研究或媒體申請以及訴訟和犯罪調查等等。而在個人申請部分已經約有 170 萬的東德人申請調閱，相當於東德人口的 10%。

不過因為當初 Stasi 建檔時網際網路尚不發達，因此無法將這些龐大資料電子化，查找起來也就十分麻煩。

若今天有申請人提出申請，工作人員就必須從上千萬份的索引資料卡中人工核對是否有申請者的名字出現，光這個步驟可能就要花費半年的時間。而之後若發現該申請人留有案底，工作人員便要開始分頭找尋資料，資料少的話最快幾個月就能完成，但也有一些拖至兩年的例子。待資料整理完畢後，檔案局會通知當事人到現場或檔案局旗下的十二個分支機構抄寫或影印，但不能把正本帶回家，而這整個申請流程是不需要負擔任何費用的。

另外檔案局本身也設有研究部門，專門解讀情治檔案，到目前已出版上百本專書，探討議題包含情治檔案慣用語、史塔西的組織結構、吸收線民和蒐集情資的手法及史塔西監聽民運人士的電話譯文等等。檔案局局長 Roland Jahn 曾說：「學術研究是檔案局的工作重點，我們的出版品，特別適合做歷史研究者的參考資料。」而這些檔案局出版的專書、刊



圖六：東德時期之監聽設備。



圖五：國家安全部 Stasi 部長辦公室。

物和解說摺頁，幾乎全部都可以免費索取，或在網站上直接下載。

耗時多年的檔案修復計畫

不過檔案局內的檔案從原本雜亂無章的碎紙片(見圖三)到今天如此有系統性的重建，其實也讓德國政府花費了不少心思。這個大規模的檔案修復計畫始於 1995 年 2 月，剛開始大家也是毫無頭緒，只能從碎紙袋中一張一張紙片拿出來核對，像拼拼圖一樣慢慢拼湊。但按照這樣土法煉鋼的做法做下去，一個人一天頂多也只能拼對出 10 張。依據他們統計，經過 10 年的努力他們僅修復約 90 萬張紙的內容，而這些資料只占了所有秘密檔案中的 3%。照此速度計算，他們要 400 年才能處理完所有的檔案袋。

因此到 2000 年底，德國議會通過決議，要求政府啟用現代化工具來取代人工作業。德國政府委託柏林弗朗霍夫研究院(Fraunhofer Institute)開發高速掃描技術，至 2003 年，該研究院宣佈，只要把紙片貼在薄膜上，經傳送帶高速通過大型掃描設備，再由多台平行運作的電腦將破碎的文件拼在一起，就能在 5 年內完成 6 億張檔案碎片的拼湊，成功解決檔案修復問題。

史塔西博物館

史塔西檔案局為政府機構，一般民眾不能隨意進出，但如果對東德當年的監聽設備及

所留存的史料有興趣的話，史塔西博物館是對外開放的，民眾可以購票進入參觀。史塔西博物館就建立於柏林 Stasi 總部原址(圖四)，現有多個常設展及特展，讓參觀民眾更加了解極權統治對人民的監控和迫害。博物館內也大致保留了當年的辦公室設施，偵訊室以及許多秘密警察的監聽設施和工具(圖五、圖六)。依據展館資料顯示，當年居住在東德的人，估計有三分之一，約 600 萬人曾被建立過秘密檔案。

結語

德國一直以來都是個不平靜的地方，他們在歷經了納粹極權統治、東德共產體制後還能在今天成為走在科技尖端的先進國家，或許與其面對歷史事件的態度有關。在查找資料的過程中，我發現雖然德國歷史曾有諸如以上令人感到難過的事件發生，但他們不會刻意隱瞞真相抑或塗改歷史資料宣稱自己是清白的。他們對待歷史過錯的態度十分謙卑，致力於尋求補償辦法，希望後代謹記教訓並避免歷史悲劇重演。其實在過去也有如白色恐怖的類似事件發生在台灣，其中所造成的許多誤會與不諒解到今天仍然深深影響部分台灣人民的心理，造成政府與民眾雙方對立。若我們也能開始有建構轉型正義的想法，或許就能如同檔案局局長 Roland Jahn 所說，「在真相和責任釐清後，開啟對話與和解的可能」，讓台灣成為一個更好、更進步的國家。